1. **导论：如何认识中国古代海洋文明及其现代意义？**

在黑格尔眼中，西方人更倾向于征服大海，利用海洋进行商贸往来从而获取利润，甚至进行殖民掠夺，使得西方人思想更为开放；而中国的耕地文明十分发达，使得人们闭关自守，不管其航海技术如何发展，都没有影响到中国的文化之中，古代中国人认为，海只是一种地理层面上的陆地的中断，他们不与海发生积极的关系。

中国在历史上素来不是一个以海洋为发展主线的国家，但在漫长而宽阔的亚洲海岸线上，海上贸易和移民活动虽偶有中断，却从未缺席。海洋和航海影响并塑造着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在衍生和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华海洋文明﹔在世界海洋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海洋文明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大陆性”或“海洋性”、“陆地文明”或“海洋文明”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中国的海洋经略并非仅仅是液舟海上的行动，也包括对于沿海地带的开发和经营——近海地区的发展水平是舰船建设和海上贸易的基础，不能简单以地理概念将其分割为陆地。总的来说，古代中国对陆地和海洋的探索与利用是历史长河中两条并行不悖的船只，它们或许在国家战略中偶有轻重之别，但在文明层面却同等重要。

中国自古以来有着漫长的海岸线，中国的海洋文化的发展也源远流长。广大的沿海地区人民在几千年的历史中，靠海、观海、吃海、用海、思海创造了博大精深的海洋文化。在这些丰富的海洋文化中的一些自然观和科学思想，历经千年依旧熠熠生辉、光彩夺目，对现在的我们的生产和发展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中华民族很早就和海洋打交道，开发海洋资源，开辟海洋通道。中华文明生长发育的根基在陆地，“以农为本”的思想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基调，古代由农耕生产方式而生成的中华传统文化是典型的“河流—大陆型”特征。但是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明显的“河流-大陆型”特征，但中国既是一个内陆大国，也是一个海洋大国。所以，在中国文化的血脉中，既流淌着农耕文明的血液，也流淌着海洋文明的血液。正是这样，中国的海洋文化与西方海洋文化的冒险性、商业性产生了较大的区别，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海洋文化。

中国古代海洋史从整体文明史的角度告诉我们，陆地文明是文明的主流，海洋文明是文明的主流。它启发我们，既要传承传统文化，更要重视海洋国家战略。我们可以利用好中国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新时代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畅通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覆盖我国东南沿海与南海、南太平洋、印度洋、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加强经济贸易往来，促进文化交流互通。

一、 中国传统海洋文化中的自然观和科学思想  
  
（一）自然观  
  
考古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中国沿海地区就己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已懂得了“木浮于水上”的道理，并随着火与石斧技术的改进，开始出现了最早的船舶—独木舟，为海上航行创造了更好的条件。随着船的出现和捕捞工具的进步，近海渔业有了较快的发展。  
  
中国传统海洋文化自然观的发展是以“以海为田”的海洋农业基础之上逐渐发展起来的。沿海地区的人们通过长期生产生活活动的体验，不断积累起对海洋本身的认识，包括海洋地貌、海洋气象、海洋水文、海洋生物等多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海洋型或者有海洋色彩的自然观。  
  
远古时期，甲骨文中有关海的字已不少。水流千里，必归大海是很早清楚的。庄周、屈原等人进一步思索，既然百川归海，为什么海水不会满；又为什么不管大旱还是大涝，海平面却始终稳定不变。据此，先秦时已建立起海洋广阔无垠、深不可侧的海洋观，并又将海洋命名为“ 巨海”、“ 大壑”、“百谷王”、“无底”、“天池” 等名称。因此，在先人的心目中，便形成了对大海的崇敬和敬畏之情。从古代一些文献记载中也可以从之体会到这种崇拜和敬畏之心。  
（二）科学思想  
  
中国古代沿海地区的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为了适应自然界的变化进而“兴鱼盐之利，行舟楫之便”，逐渐总结和掌握一些科学思想。比如，《吕氏春秋》提出了水分海陆大循环的学说，《管子》提出维护生态平衡的理论和合理开发生物资源的思想等。  
  
早在东汉时期，王充就提出“涛之起也，随月盛衰”的潮汐月球成因说和潮月同步原理，创元气自然论潮论；发现了高潮间隙；提出暴涨潮的地形成因说。东汉马援在琼州海峡两岸树起了潮信碑，供渡海者使用。唐代窦叔蒙应用天文历算法，精确推算出潮汐周期为12时25分12秒；总结出潮汐的半日、月、年三个基本周期；发现了分点潮；绘制了直观的天文潮汐表。五代末赞宁和尚编制了钱塘江潮候口诀。在此基础上，1056年吕昌明编制了《浙江四时潮候图》。此潮汐表在元代刻成石碑立于钱塘江畔浙江亭，供渡江者使用。  
  
先贤们试图通过科学的方法解释潮汐的成因变化，为人们渡海提供科学的安全保证。另外，对潮汐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学艺术的发展。壮观的暴涨潮是中国古代海洋文学艺术中突出的主题。  
《尔雅》、《说文》、《临海水土异物志》、《魏武四时食制》、《博物志》等书不仅记载了许多海洋生物，而且逐步形成在每一种类下，记述名称、形态、习性、用途及地理分布的海洋生物志体例。不仅为渔民打鱼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提高了打渔的产量，也开辟了新的海洋生物的记录方法；明清的地方志中，保存了丰富的海洋自然灾异等现象的记载；黑潮洋流被发现并用于海运等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对我国现代发展海洋仍存在重要的作用。  
（三）对外交往  
中国传统文化以和为贵,以邻为睦,中外海上友好交流也源远流长。隋唐时,日本遣隋使、遣唐使不断来中国学习,得到中国的友善接待和无私帮助。唐代鉴真更东渡日本,传授中华文化。宋元时,在泉州港甚至形成市舶司官员为外国商船返航祈求顺风的礼仪。泉州的九日山祈风石刻遗址,充分体现了这种友好的政策。郑和下西洋恢复发展了中国与东西洋各国的友好关系,国外使臣不断来华。1413年印度古里派来使臣和随从人员就达1200人。1417苏禄国(位于今苏禄群岛)东王巴都葛·巴哈刺与西王、峒王率340人的大型使团访问中国,受到明朝政府盛情接待。归途中东王病逝于山东德州,就地埋葬。明成祖朱棣下令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亲撰碑文。1419年郑和船队回国时就有17个国家的使臣来华。从洪武开始,明朝与琉球建立封贡关系,十分友好,册封新国王一直就是琉球国上的一件大事。  
  
二、 现代启示  
  
（一） 海洋敬畏与生态保护  
  
由于古代人民对海洋认识程度较低，所以他们对海洋的浩瀚无边一般都存在一种恐惧的心理。又因为古代的沿海人民要靠海洋获得生存所必须的食物，所以他们一直对海洋充满了敬畏。《管子》提出维护生态平衡的理论以及古 “四时之禁”的政策还有海神崇拜等都表达了古代沿海地区人民对海洋的崇拜和敬畏。正是这种敬畏的存在，人类在产生任何活动的时候才会有所顾虑，才能更发自内心的更纯粹的思考和行动。这样恰好在更深程度上保护了海洋，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海洋的认识不断加深，对海洋的敬畏之心逐渐减弱，对海洋的开发越来越深层次化。人类追逐经济利益，无限制的开采海洋资源、捕捞海洋生物，发展海洋军事、海上交通。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系列海洋带来的灾难。海洋生态环境的不断破坏，海水污染，海洋生物灭绝等都给人们敲响了警钟。  
  
虽然，中国古代对海洋的敬畏早已不适应现代科技和经济的发展的需要，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给与我们生态保护上的启示。先贤们几千年前的自然观就体现了一种朴素的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对现在经济科技高速发展而言更要继续发扬，发挥其积极作用。我们要在一定程度上敬畏海洋，尊重传统的海神崇拜，尊重海洋发展的规律，在各个地区发展海洋经济的时候要保护海洋的生态环境，保护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人与海洋和谐发展。  
  
（二） “以海为田”与海洋资源开发  
  
中国古代的海洋观影响下的海洋文化有明显的农业性。古人的“以海为田”，充分利用了自己已知的海洋知识，发展海洋资源为农业发展服务。春秋战国时期北方的齐鲁、燕昭，南方的吴越就以鱼盐之利为富国之本。秦汉时期也出现了牡蛎的养殖。明清时海洋软体动物养殖已广泛分布于东南沿海，出现了蚝田、蚶田、蛏田等，并均从“田”意。明代出现了海洋鱼类的养殖。海盐的生产更是源远流长，传说炎帝时就已煮海为盐。  
  
现代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使我们不再满足于最基本的海洋需求。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在大陆上资源渐趋枯竭的前提下，谁能尽早的利用海洋谁就掌握了发展的先机。然而，对于现在的我国来说对海洋的利用还少之又少，仅仅局限于渔业、盐业以及海洋矿产资源的开发。在未来我们要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海洋的巨大作用，使之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价值。比如，风能、潮汐能和波浪能等都是清洁能源，而且能量巨大，在未来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几种资源为经济发展提供能量。另外，在未来海洋资源的开发中更应加大锰结核、天然气水合物等的利用。  
  
（三） 科学思想与防灾减灾  
  
古代的海洋文化中形成的科学思想对现在的海洋资源的开发以及沿海地区的防灾减灾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公元前48年起，潮灾被连续不断地记录下来。为战胜风暴潮灾，自汉代起建起雄伟的海塘。海塘与长城功能一样均是保卫沃野千里的农业区。海塘在世界海洋减灾史上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沿海地区是我国人口集中、经济繁荣的地方，但这里又是潮灾能量集中的地区。我国古代丰富的潮灾记录是一个丰富的自然史信息库，对我国潮灾规律的探寻和减灾事业都有很大的价值，有待于开发和利用。  
  
结语：中国古代海洋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虽然其中的一些思想已经不适应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但其中蕴含的独特的海洋观和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总结的科学思想仍然对中国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积极的启示作用。我们应积极汲取先贤们的科学的海洋观念和思想，在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同时保护海洋环境，并充分利用先贤们遗留下来的科学的数据促进当今的防灾减灾建设，保护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促进海洋经济和海洋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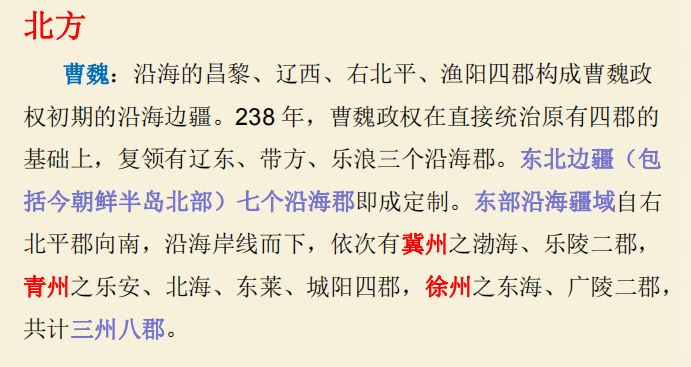
1. **在中国古代海疆地理变迁的过程中，北方海疆和南方海疆分别有怎样的表现?尝试选择有代表性的时期分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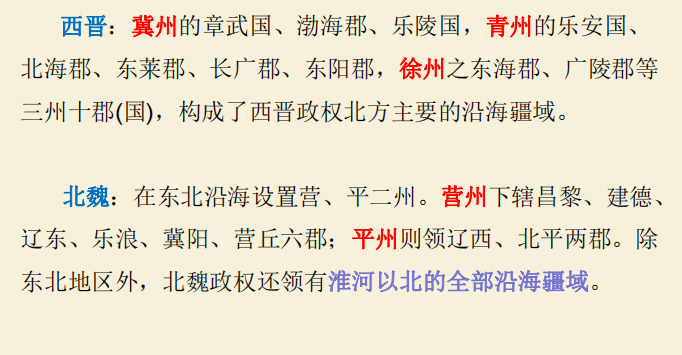
总体来看，以大山大川乃至以大海作为自然屏障，这种现象在春秋时期已经开始出现。限于当时的科技发展水平和由此导致的认识局限，统治者们还没有从主观上把海洋纳入国家疆域之内，“海疆”也没有固定的概念。但从客观上说，中国古代海疆早就存在，它不是单纯的海岸线或者海岸带，而更多的应该是一个“沿海疆域”的区域概念，包括海岸线以内的沿海地区和靠近大陆的海岛在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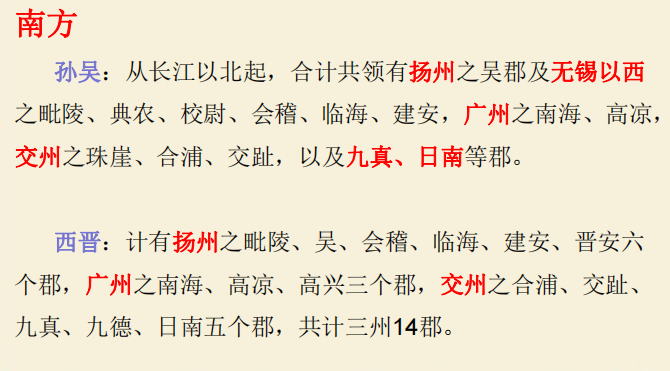
隋朝管辖的沿海郡共有33个。北方沿海疆域范围较之前大为缩小。乐浪、带方的郡县设置此时已为高句丽占据，辽东郡也已归高句丽管辖，而高句丽以北大部分沿海地区此时为酥羁等部落民族所据，处在较为原始的发展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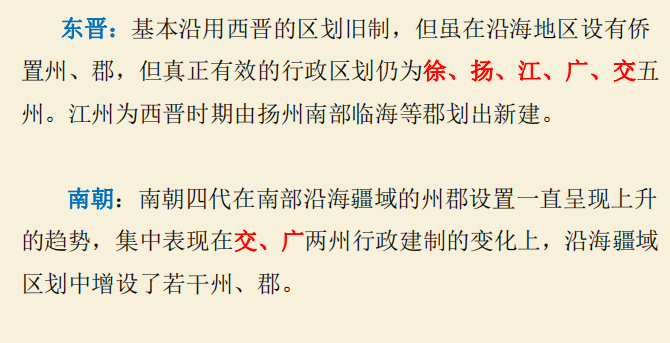
大业初年“南征林邑”的结果，使隋朝的南部沿海疆域向前延伸，甚至超出了传统上以日南郡为南端所构成的中国疆域的界限。

盛唐时的海疆，北段包括鄂霍茨克海，经日本海西部水域至朝鲜湾到渤海;中段包括有黄海、东海;南段则直抵北部湾。盛唐时期的沿海及海上管辖区域已经覆盖了几乎全部东亚大陆的沿海区域，从北纬50°南伸至北纬15°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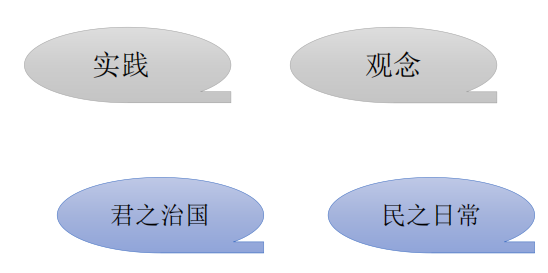








**3.思考先秦时期的“人”与“海”发生了哪些联系，尝试总结这一时期中华海洋文明的特点。**



从君之治国角度来看，盐业成为统治者治国的手段。齐国文化中，“设轻重鱼盐之利”、“海王之国，谨正盐策。”春秋时期，齐国的"渠展之盐"便天下闻名。齐桓公听从管仲的建议采用"官山海"政策来管理盐政，"寓税于盐"以获取税收;同时，还有相关的储运和贸易活动，将海盐以高价卖给其他周边国家，来赚取高额利润、充实国库。后世的统治者也纷纷学习先秦时期齐国的盐业政策，以此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壮大国家经济实力。比如汉代官府参与到食盐买卖过程中，唐代国家盐利收入已占到半数，宋代施行钞盐法，商人向政府交钱领取钞盐券，凭券买盐销售，元代收取食盐税，盐利已占到国赋十之七八，明代施行“开中法”，商人必须先运送军粮才能再运盐，清代则设立专门的盐务部门，实行“引盐制度”。统治者通过管控、纳税、用于征战等方式掌握盐业，进而治理国家。

从民之日常角度来看，先秦时期，人们捡拾贝壳并将它们当做食物，由此形成了考古学上的贝丘遗址。井头山遗址是中国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海岸贝丘遗址。目前发现的贝类中，牡蛎最多，其次是蜡、螺、蛭、蛤等。此外，还有很可能是古人盛海贝的篓子、筐子等器物。这说明已经开始有渔业的产生，人们开始从大海中获取食物。甚至，有人以海洋为基础办起实业，耕于海畔，比如陶朱公浮海出齐，三徙，成名于天下、名垂后世。他所写的《陶朱公养鱼法》、《养鱼经》、《陶朱公养鱼经》都是有名的著作。当然，从海中获取的盐也是民之日常中重要的一部分，远古时期的人们“鱼盐所出”。

从实践角度来看，主要分为渔业和行船两个方面。渔业指人们从大海中获取贝类，养殖鱼类为食等等。在行船方面，《越绝书》中提到“戈船三百艘”。这说明在当时已经有建造船只的实践活动，航海技术有了一定的初步发展。商代，"箕子去国"与"殷人东渡"可谓海上航行的大事件。春秋战国时期，海洋航行更加普遍。因躲避灾祸、国家流放，很多人已经通过海上航行、入海寻找其他陆地生活，可见先秦时期人们已经能够熟练地出海航行并且适应了海外生存。同时，海上航行，必然会与其他沿海地区或海上国家发生联系，也因此产生了一定的贸易往来。春秋时期，齐国的商人已经能够把商品带入朝鲜日本地区。

从观念角度来看，人们认识到海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对海的认识是一个由虚到实的过程。"四海"最初的意思是泛指包围大陆的全部水域，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才逐渐有了方位的含义，分为北海、东海、南海、西海。邹衍由小推大得出世界上一共存在着九个。而且当时流行的"四海说"也让邹衍认识到中国之外还有广阔天地，中国仅仅只是世界的一部分。邹衍"大九州学说"体现的地理观是对"盖天说"和"浑天说"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四海观"的延伸和演变但"大九州学说"真实反映了在战国时期，古代中国的人们已经开始"睁眼看世界"。

**尝试从认知与实践两个角度总结秦汉时期海洋文明发展的特点**

总的来说，实践带来认知。秦汉时期海洋有以下几个特点：

海洋地理观念被普遍重视、海洋意识觉醒，统治者将海视为自己统治的一部分；海洋巡视萌芽产生；统治者向海上追求长生、神仙；通过盐利管控地方，加强统治；海洋军事逐步发展；海洋航路上的朝贡和商贸繁荣。

从认知角度来看，从先秦文献中发现，战国时期政论家便频繁使用“海内”这一政治地理学概念，且“海内”与“天下”对应出现。此二词并用，说明当时中原居民关于海洋意识的初步觉醒。这一语言习惯在秦汉政论家论著中依然明显，这些文字反映了以大一统理念为基点的政治理想的表达，表明涉及海洋的地理概念被普遍重视。随着统一中国的秦王朝的出现，海南海洋第一次构成了中国南部海疆的一部分。

此外，在《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琅琊刻石全文中，我们可以找到与“海”有关的政治表述，比如“事已大毕，乃临于海”、“东有东海，北过大厦”。这些表述说明了统治者对于海洋的重视，已经开始把海洋纳入自己的统治理念当中，把它当做自己的疆域的一部分。

从实践角度看，秦始皇对海洋的热情，最初只是去往帝国领土的最东端，以期宣示权威，控制领土。与秦始皇一样，汉武帝也多次巡行至海滨地带，显示出两位帝王对海洋世界的重视和控御需求。始皇、武帝的海上祭祀、东海神主礼祠、海上射巨鱼、江上射蛟等活动，都是其中的一部分。海洋巡视的萌芽自此产生。

秦汉大一统政体成立后，秦汉执政者的海洋意识与沿海控制有多种表现。汉初平定“七国之乱”的重要一环，就是要通过削藩而夺回诸侯王国所掌控的沿海区域，收回对渤海、黄海、东海的统治权，对珠崖即海南岛的控制亦是如此。

此外，秦始皇陵中也有海洋元素，比如司马迁所记载的“以水印为百川江河大海”。在航海方面，有徐福出海求仙人。对于燕齐方士这一群体，在他们的方术欺诈和荒诞宣传之外，还应当看到，这些人是环渤海地区较早关注海洋景物并开发海上交通的知识人群。他们的海洋探索因帝王们的长生追求而获得行政支持，其海上航行实践，对于海路交通的开辟和海洋知识的积累起到部分积极作用。

汉代建立建章宫太液池，象征北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秦朝设置南海郡，汉朝设置朱崖郡，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统治者对于沿海地区管控的加强。

在军事远征方面，秦代有楼船士一说，到汉代，楼船军已经成为一个军种，这体现出秦汉时期开始重视对沿海地区布置军事力量，海洋军事有了初步的发展。

在航路方面，秦汉时期主要有通往东洋与南洋的航路，《汉书·地理志下》:“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说明海外各国已经有通过海路前来献见汉朝统治者，体现汉朝的强大，海洋商贸也变得更加繁荣。

盐利再次凸显，统治者向各郡派驻盐铁官，以加强对地方的掌控。

**借助相关史实，思考海上丝绸之路南航线与北航线在唐代对外交往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PPT：

与秦汉时期有所不同，唐王朝与海洋的关系体现出更明显的外向型趋势。

这一时期航海事业的发展，在空间上已经大大超出了传统农耕经济的范围。

海上航线的开辟,增加了东亚大陆与外部世界的交流通道;

海上贸易的发展，对以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越来越多的推动作用;

通过海上通道开展的对外文化交流，对于以唐朝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

日本和新罗通过北航线对唐王朝进行朝贡，《新唐书》记载“玄宗开元中，(新罗）数入朝，献果下马、朝霞轴、鱼牙细、海豹皮”，“帝间赐兴光瑞文锦、五色罗、紫绣纹袍、金银精器”。遣唐使出使中国频率很高，遣唐使的频率:新罗为1.6年，高句丽为2.1年，百济为1.7年，渤海为1.8年，日本平均20年派出1次遣唐使。虽然路途遥远，但出使的好处很多。

其次，唐朝设立押新罗、渤海两蕃使，令节度使担任，对入唐的蕃国人进行管理保护，体现了唐王朝对于属国的重视，也表现出唐王朝对于海上朝贡的重视。

张保皋荡除海盗，掌握了东亚海上贸易，是韩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开展海外经营的伟人。他在唐朝逐渐发展到执掌黄海，拥有威胁朝政的能力。但由于其出身侧微，在朝臣阻拦之下未能联姻，最终被杀害。鉴真东渡，对促进中日关系和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

唐代中期，地处欧洲与东方之间的阿拉伯 (大食) 帝国兴起。其时西域交通自 “安史之乱”后渐趋萧条，甚或衰败。故这一时期东西海上交通日益进步，西方商旅在与东方的交往中，多舍陆路而取海道。大食帝国所属波斯湾、红海沿岸港口遂成为航海活动的中心，且由中东地区至中国的海上交通较之以往大为扩展，自红海、波斯湾直接航行到中国的路线亦已彻底开通。由巴格达，经波斯湾东出霍尔木兹海峡，穿过印度洋，经斯里兰卡、尼科巴群岛，绕马来半岛，由南海而至交州，或广州、福州、泉州，或北上扬州的航线已成为海上繁忙的贸易路线。

1. “海上丝绸之路”与古代物质文明传播

自唐代始， 陶瓷已是外来蕃商采购的重要物品，从长沙窑、龙泉青瓷窑、德化窑，到景德镇青花窑、漳州窑、潮州窑等，都有外销瓷生产。宋代中国制瓷技术业已成熟，精美的瓷器成为与丝绸并驾齐驱的代表性商 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贡献 83 品，亦成为中国的文化象征之一。近数十年来，发现于东南亚苏门答腊海域的唐代大食 “黑石号” 沉船，中国闽粤一带的泉州宋代法石古船、阳江南海 1 号、潮汕南澳 1 号，其装载货物无不以瓷器为主。中国陶瓷源源不断输往海外，也促进了沿线各地陶瓷制造业的发展。古代东南亚、埃及、波斯、土耳其等地就因中国瓷器的大量引入促进了本国制瓷业的进步。

丝绸、瓷器、茶叶、工艺 品、金属制品等，经由新开辟的海上通道运向欧洲、美洲，同时美洲的重要作物如番薯、玉米、烟 草、马铃薯、花生及白银等经由欧洲人输入到东南亚和中国，大大丰富并改变了东方的社会物质生 活。显然，在古代东西方 “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商品的互补性始终是这一通道活跃的重要动力 与支点，而且这一贸易往来也始终处于互利、和平的氛围中。

1. “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沿线不同文明的交往

仅就宗教文明来看，“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宗教传播的重要通道。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皆由 “海上丝绸之路”陆续传入中国，而佛教、祆教、犹太教等亦在东南沿海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遗迹，从而见证了 “海上丝绸之路”诸港埠的开放包容。唐代六祖惠能创立南派禅宗，对海内外佛教产生了深远影响。伊斯兰教亦自唐代由海路首先传入，中国穆斯林广为流传的阿拉伯教士宛葛素所创建的怀圣寺，成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重要标志，亦被视为 “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文化遗产。

1. “海上丝绸之路”推动了人类航海文明的进步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离不开船舶制造水平的提高、航海技术的运用及航行经验的积累。而航海文明的交流，是海上交通始终充满活力的保障。

至唐代，来自波斯湾诸港口的 “波斯舶”，在当时印度洋、太平洋

水域具有广泛的影响，僧人慧超 《往五天竺传》即载: “波斯常于四海泛舶，亦泛舶汉地，直至广州。”时许多中国僧侣到海外求法，即乘坐波斯舶。

唐代后期，中国造船技术有了显著的提高，所制海船以船身大、载货量多、结构坚固、设备完善、抗风力强而著称于世，并多往来于中国和印度洋以西的水域。阿拉伯文献《中国印度见闻录》云，远航印度洋和波斯湾的中国海船，都是铁钉铆牢，船板非常坚厚的巨舶。由于其载量大，吃水深，驶近阿拉伯地区时不能直接进入波斯湾内水域较浅的巴士拉等港口，只能停泊于尸罗夫。

唐宋时波斯、大食海舶中多畜养有信鸽，船舶每泊一地，或遇到风险，常以放飞信鸽相告。而至迟在 11 世纪末中国罗盘亦已用于航海，从而推进了东西方航海的发展，对中世纪海洋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

1. 海上丝绸之路”与古代科技文明交流

唐时期，印度的天文、历算、医学、制糖法以及与本草有关的许多植物输 入中华，大大影响了唐朝的科技与文化建设。这一互通有无、彼此提高的科技文化交流现象，贯穿于古代 “海上丝绸之路”的交往中。它不 仅开阔了不同地域人们的视野，也促进了各自文明与技术的进步。

1. “海上丝绸之路”造就了大量史籍文献的产生

成书于 8 世纪的阿拉伯人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 《道里邦国志》以及由商旅撰就的《中国印度 见闻录》，是记述唐朝穆斯林鼓舶东航，于海上往来所见所闻的重要文献，两书提供了这时大食商人由波斯湾海岸诸港口至中国广州详尽的海上行驶航程。，可以发现古代东西方商人、旅行家、航海家、使节、僧侣、教士等，均在 “海上丝绸之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文化史视角，以中、外文字重新系统整理、编辑、出版这些 文献，不仅可使沿线国家民众对 “海上丝绸之路”有直观、清晰的认识，也将为 “海上丝绸之路” 这一人类共同文化遗产提供有力证据。

**(1)随着宋代造船和航海的发展，宋人对海洋的认知较此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宋人的海洋意象已全然没有了秦汉时期神仙世界的影子，海洋世界变得更为清晰而实际，这是伴随着宋代海洋知识日益丰富而出现的变化。

长期从事航海实践的海商群体是宋代第一手海洋知识的主要来源，参与航海的使节和僧侣也提供了部分第一手海洋知识，历代典籍有关海洋的记载也是宋人获得海洋知识的途径。

日益丰富的海洋知识通过多种途径的传播，使宋人对海洋的理性认识有了深入。宋人眼中的海洋，是由潮汐、季风和洋流组成的动态的海洋世界:同时仍是一个由客观危险和怪异想象构成的险恶而奇异的世界，这一认识也推动了宋代海洋信仰的发展:由于宋代官民都在日益发展的海上贸易中获得利益，海洋又被认为是一个充满财富和商机的世界。宋人已能比较清晰正确地判断诸国的地理方位，对中国与周边世界的地理关系的认知有了明显的科学推进。

**(2)以市舶制度和漕粮海运为中心，思考宋元时期海洋经略与国家财政之间的紧密关联。**

宋代市舶制度与国家财政

宋政府在一切可以设司获利的港口都设了市舶司。除广州外,还先后于泉州、 杭州、明州设司,并于温州、华亭县、通惠镇、江阴等处设市舶务或市舶场。市舶司经济地位的提高还表现在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先从贸易货物种类看，北宋初,禁榷品八种,放行贸易品三十七种,合起不满五十种。至绍兴十年裁定,合起发运京师的细色物七十种,粗色一百一十种,还有过于笨重,在市舶司所在地出售 的一百四十种,较之北宋初增加了数倍。再从贸易数量看,以香料为例,《中书备对》载:明、杭、广“三司三年出卖乳香入钱八九四七一九贯三0五文,“其中熙 宁十年就收人三十一万贯之多。乳香仅是禁榷货物的一种,加上其他禁榷物的博买,可以想见宋代市舶司的营业额是相当可观的。

宋代市舶司较唐代更加完善和发展，同时由于宋代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财政常常拮据。其收入主要来自东南地区，然“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由于“市舶之利颇助国用”，所以宋置市舶司“掌市易南蕃诸国物货航海而至者”，“掌番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所以与其他朝代相比，宋代特殊的国情使市舶司经济地位尤其突出。可以说宋代市舶司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增加收入，辅助国用这一中心展开的。市舶司的税收功能不但不能从积极方面激发商人的经营热情，他的工作效率越高，税收成绩越大，就越有可能给外贸经济造成损害。此外，为了让市舶司的抽解、博买发挥最大功效，还赋予市舶司以独占权，又规定远洋商船只能在设置市舶司的少数几个港口出入，因此，市舶司作为一个垄断海外贸易的机构，虽然获取了巨额市舶收入以辅助国用，维持宋王朝统治，随着宋政府对外贸蛮横控制的日益加强，阻碍外贸经济正常发展的弊端日益显现。

元代海洋和国家财政

与唐、宋相比，元朝海外贸易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增大，贸易形式更为多样化。与此同时，元政府非常重视海上对外贸易，对海外贸易的管理也比前朝更为制度化和正规化。元王朝制定的内容丰富、体例严密，堪称中国古代对外贸易法的典范。于是，元朝成为我国海洋大发展的历史性重要时期，14 世纪中国浓厚的重商主义与同时期欧洲地中海沿岸的商业精神交相辉映，有过之而无不及。

①货币

交换的基础——元朝宝钞作为元政府发行的全国通行的货币，在国际贸易中亦能通行，影响南洋、波斯、甚至欧洲等地。地跨欧亚的元朝大一统帝国形成后，统治者非常注重从世界范围认识自己，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秉承着对外开放“四海为家”的意识，一直与他国开展主动、频繁的对外交往。

②主体

元朝中央政府一直致力于有效地控制海外贸易，因此它的官方海上对外贸易主体非常有特色，分为使臣、斡托和官本船三种：

元朝国力强盛，朝廷除了对朝贡贸易加强管理之外，还经常派遣使者到海外采办奇珍异宝。整个元朝，中央政府派出的使臣足迹遍布海外诸国，远达非洲，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元朝的法律详细规定了使臣出海进行对外贸易的法定程序：使臣由皇帝赐予诏书，佩戴牌符，提供专用驿马；出海港口地方政府必须提供船只，支付使臣航海过程中的粮饷；使臣的法定职责就是为皇室收罗各地珍奇异宝。

元代斡脱商人中的贷官权，是专门为政府经营海上对外贸易的商人。他们作为蒙古皇室的御用商人，常为西域色目商人，不同于一般海商，享有各种特权，是官营海上贸易的特殊合法主体。斡脱商人打着官府经商的招牌，贩运违禁物品，牟取超额利润，营私自肥。

官本船作为海外贸易主体，是元朝官方海外贸易的一大创举。海上对外贸易由政府垄断，实行官商合营模式。其中，船和本钱都由官府提供，并由官府挑选商人进行经营，出海利润七三开。同时，为了保证官本船法的顺利实施，元政府实施海禁，禁止私人下海贸易。

③海上外贸船舶管理及其税收

元朝的商船出海必须持有市舶司发给的公据（大船）、公凭（小船）公据和公凭必须包含法定内容，加盖关防才能放行，同时它们并不是简单的许可证，要求商人在国外购买舶货时一一记录，作为回国后抽分的依据。出海船舶雇佣的船员必须在市舶司登记，并相互作保。法律规定舶商在申请公凭和公据的时候，必须有保舶牙人作保，此间，牙人作为中国古代传统贸易中的第三方公证人，开始承担鉴定船员人数、船只大小、所买货物以及去往何处等内容的职责，是我国早期进出口商品检验的萌芽形态。

而对于关税，元朝所有海外贸易的货物必须进行“抽分”。进口税、出口税、舶税、转口税等，构成了元朝完善的市舶税收体系。在管理进口货物税收的同时，市舶司还负责沿海贸易。元初，国货与蕃货在征税的税率上是相同的，这是因为元政府认识到必须采用国家干预，才能既防止国货大量低价流出、又增加进口商品的数量。国货、蕃货抽分有别的税收制度，充分体现了元朝市舶税制的经济杠杆作用，对调整进出口货物的价格和比例有着重要意义。

官员和商人为了逃避抽解，常常会隐匿舶货或在中途转移和出售。元政府为了加强管理，严惩走私行为，对使臣、民商、外商出入境都作出了相应的法律规定，而且对于徇私枉法或渎职的市舶官员，也细化了相关的法律责任：除市舶官员外，还要派出与市舶业务无关的官员监督和复核，不得亏官损民，并不许现任官府权豪势要人等假借他人之名购买。对于故意纵容商船不前往原发舶港抽解的市舶司官员，决杖五十七下，并撤销其职务，同时相关舶商、船主、纲首、事头、火长也要各杖一百七下等等。

④渔业和盐业

渔业和盐业是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沿海居民赖以为生的传统职业。据《元史》等文献记载，元代海洋渔业相当发达，一些珍稀物品（如鲨鱼皮）还被作为土贡送往大都。东南地区有漫长的海岸滩涂，长期以来就是海盐的主要产区。元朝继承宋代的沿海盐场，积极改进制盐技术，努力提高海盐产量，通过专卖体制，获得巨额收入，“国朝定煮海之赋，倍于前代，邦用是资”。

**1从全球史的视角，结合具体史实，认识郑和下西洋在构建明帝国与外部世界关系层面的意义。**

明朝时期，众多海外各国来朝纳贡，东非国家进贡的是长颈鹿，国人就把长颈鹿叫做麒麟，史称“麒麟贡”，将祥瑞动物与外交政权相结合，证明了明朝对世界的影响力，宣扬了明朝的国威。又比如利用外交诏令向各国抛出橄榄枝，利用“麒麟贡”，以此来强调明朝的“天下”大国地位。

过洋牵星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明代航海技术的发达，《郑和航海图》与“西洋三书”描绘了郑和航海的盛况。

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柬埔寨等国家都有郑和寺庙，如马来西亚马六甲宝山亭、印度尼西亚三宝垄郑和庙

1405年开启的这场东方大航海，是当时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跨洲远洋航行。由郑和下西洋航海实践及其相关文献所拓展的海洋知识，和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所带来的海外新知识，构建了明人的海洋意识。

郑和下西洋作为大航海时代的前奏，将东亚和南洋的各个分离的地区连成了一片，与之后欧洲探险家的地理大发现共同开启了东西方海洋交流的新阶段。

郑和下西洋使明人逐渐认识到海路的重要性。东西航路是否通畅，直接关系到明朝的“建邦大业”。

郑和下西洋所打通的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路，为明末以后数以千计的西方传教士的直接来华做了交通上的准备，传教士所带来的海外世界的新内容，也为明人重新理解世界、认识海洋奠定了基础。文明舞台限于亚欧大陆的格局归于终结，东西方开始进入了一个互相交融与冲突的新时期。

**2从官方海疆经略与民间海洋需求之角度，总结明清时期海洋文明发展的特点。**

随着宋元时期海外贸易的发展, 人们的活动也越来越多地走向海洋。明清时期, 倭寇和殖民势力的发展, 使统治者逐渐意识到海洋天然屏障的地位开始动摇。于是明朝一度实行海禁政策, 严格限制私人贸易与海盗的勾结, 推行官方朝贡贸易政策, 主要表现为官方航海贸易。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 使中国海洋文化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官方朝贡贸易和海上航路也达到了最高峰。

明太祖的海禁政策，使唐、宋、元以来的海外贸易遭到沉重打击，我国的海洋文化自此走向没落之路。

清朝的“迁海”政策，使整个沿海地区的航海贸易、 交通运输出现了衰落，给我国海洋文化及海洋文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几乎把中国几千年来的海洋文明推向灭亡。

1. **官方海疆经略**

1）**海禁政策一直是明清时期海疆经略的主线,而其间又有摇摆不定的开放阶段.**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历史的纵深处来考察这一现象，则会发现明清时期海洋政策的变化脉络呈现出明显的内趋性特征。当然。从整个明清时期的海洋政策来看，两朝政府并不是完全决然地封闭了海洋大门，而是在闭开无常的摇摆 中呈现出强烈的**收缩态势**，具有明显的**内趋性特征**。 明朝弃海岛 迁民入内地和清 朝以陆防海措施的相继出台 均 是这 一特征的显 例。

在中国渐趋走向衰 落的明清时期，社会客观环境的变 化使明清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海洋的历史定位。虽然外界压力的存在使海洋几度开放，但仍无助于政策主体走向的改变，**海洋政策渐趋收缩和封闭的特征愈加明显**。 **从整体上看，明清时期海洋政策的内趋性是传统体制所 产生的必然 衍生物， 只不过在世界大势发生剧变的历史时期，它显得更加落伍和有悖于时代发展。**

1. 宋元之际中国海洋文明海陆双重帝国架构渐渐成型,由于明清时期将"禁海"作为长期国策,且将海商及海外华侨作为异己力量予以镇压.同时,经常默许乃至联合西方殖民者迫害或屠杀海外华人华侨,使得**中国民间海上力量生存空间愈益萎缩乃至蓬勃发展的海洋文明一度出现中衰,但海洋文明的基因和价值仍在.**

2.民间海洋需求

1）郑莉认为明清时期,沿海民众为了维持世代相传的生计模式,仍然持续不断地移居海外,在中国周边地区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海外华人社会。

2）明清时期,在沿海地区**人地矛盾加剧、海洋群体壮大**、**东方海洋贸易**网络形成等历史背景之下,渔团、渔帮、渔民公所等海洋民间组织逐渐发育,并成为海洋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海洋产业的发展状况、国家海洋政策的变迁以及海洋民间组织成员的观念与素质等因素直接影响了这一时期海洋民间组织的发展.明清海洋民间组织是在专制政权高压下姗姗起步的，海禁、开海的反复上演，使民间海洋组织历经了曲折的发展轨迹，**海洋民间组织在渔业发展、渔民自身的内在需求、现代社团观念和政府的外在推动等作用力的推动下，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局面。**虽然诸如渔民公所、鱼行等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异化并反过来沦为盘剥渔民的工具，但仍然不能过分低估了明清海洋民间组织在推动沿海经济社会发展、表达底层群体诉求以及维护渔民权益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尤其是这些组织所体现出的海利性和向海洋进发的无畏精神，恰恰是农业内陆人民所不具备的，这也间接地造就了一批“海域认同为先”的海洋移民，为加强中外科技文化交流、传播中华文明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当然，有一点是明清封建政府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正是在海洋民间组织以及涉海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明清海洋渔业、贸易业等蓬勃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传统农业的经营范围，在当时，对扩大城乡人口的食物来源，增加农民的收入，缓和人多地少的矛盾等，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3）**严厉禁海后，沿海人民不得不冒险移民海外求生， “交通外番，私易货物”。于是，“明中国的对外贸易，也就奇特地利用走私道——偏道作为常道”，中国已经没有合法的私人海上贸易。**遂造成日本“人利互市，留海滨不去”，“而内地诸奸利其交易，多为之囊 橐，终不能尽绝的局面。于是，民间力量因应海禁的对策，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后果便纷纷出现。

4）明清海洋民间组织历经了曲折的发展轨迹， 随着海洋群体的壮大，**在海洋群体个体自身内在需求以及海上贸易网络的推动下，明清海洋民间 组织突破了禁海政策的不利影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局面。**虽然一些海洋民间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异化并反过来沦为盘剥海洋民间组织成员的工具，

但我们仍然不能过分低估了明清海洋民间组织在海洋生产互助、维护海洋民间组织成员权益、推动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加强中外交流、传播中华文明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 另外，明清海洋渔业

、海上贸易业的蓬勃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传统农业的经营范围，在当时，对扩大城乡人口的食物来源，增加农民的收人，缓和人多地少的矛盾等，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关于这一点是明清封建政府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